

时间把许多往事淡化成烟,让你无从追忆;时间也把许多往事凝聚成史诗,让你铭记于心,经久难忘——

热风冷眼

在《寻战友》中寻找着

■李娟娟

红色旋律歌曲要越唱越「红」

■冯斌

国防纪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幸也是我一个老兵入党70周年。漫长的岁月,在枪林弹雨中送走春的花季,在雷霆万钧中迎来夏的风雨,在勤恳耕耘中收获秋的殷实,在光照百川中尽享冬雪的亮丽。这就是我们一代人的人生四季。

70年,25000多天,时间把许多往事淡化成烟,让你无从追忆;时间也把许多往事凝聚成史诗,让你铭记于心,经久难忘。20世纪50年代中华儿女抗美援朝的壮举,便是一首壮美的诗篇。离休之前,作为抗美援朝经历者的我,曾以如歌的激情、如火的豪志,把这壮美诗章中的一页,用摄影机写在银幕上——我在寻找一位失踪30多年的战斗英雄柴云振,影片命名《寻战友》。

当年我们采访国防部长、曾指挥上甘岭战役的秦基伟时,他说:“寻战友好,寻柴云振好,柴云振也是我的战友。我想念他,想念当年战斗中活着的和牺牲的每一个战友。”

尽人皆知,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向我们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打了190万发炮弹,投了5000枚重型炸弹,山头被削低两米,岩石变成了粉末。

面对着上甘岭山头,你会感到凝重的历史呼啸着从遥远的空间走来。柴云振所在的八连拼杀在朴达峰阵地上。他带着一个班(只剩4个人)夺回3个山头,消灭300多个敌人。在攻击敌指挥所时,只剩下他自己,拼得弹尽粮绝,只能赤手空拳与敌人肉搏。敌人咬掉他的手指,砸伤他的头部,他倒在血泊中。再次醒来时,已经被送回国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对于当年国家穷困、部队装备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我们的军队、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不和祖国讲条件,他们没有任何奢求。他们可以在长滩湖低于-20℃的残酷环境中整

夜潜伏,身上只着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烧成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肉搏。他们战胜了先进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显而易见,战役的胜利是被凌辱了百年的民族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无敌的。

柴云振被记特等功一次,并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此后,志愿军中相继涌现邱少云、黄继光等著名英雄。邱少云的事迹唱遍全军,黄继光的名字如三千里江山的金达莱流芳百世。柴云振呢?如皑皑白雪融进小溪,流向无人知晓的去处。

战友在呼唤他,部队在寻找他,我们也在穷尽全力四处打听他。事隔30多年之后,才在四川岳池县大佛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寻到他的踪迹。

采访中,我根据军史馆里陈列的一幅柴云振“烈士遗像”想象着这位当了30多年“烈士”的人,无疑是粗眉大眼,一身彪悍虎气的汉子。我想错了,画家也画错了。从稻田埂上走过来的是一位身量颀长、面庞清瘦的老农。柴云振所在的全县全村全家都不知道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更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只知道他是种田的一把好手、一个老实厚道的老农民。

我不理解地问他,在农村苦了30多年,为什么不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和待遇。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只是默默地抽着烟。是无须回答?还是不好回答?我又想错了。他捻灭烟头,爽快地说:“当兵就是要消灭敌人嘛,负伤了就不能去打仗了,当然就回家种地了。当兵前也是种地的嘛。”从他身上看不出什么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只是背朝苍天、面对大地干力气活的庄稼汉。拍摄中,柴云振总是拣最沉重的摄影机三脚架扛在肩上,默默地在前面爬山引路。64岁的人了,走在山梁上,步履依然敏捷。

记得正当青春年华的我,入朝参战时,曾狂妄地在日记上写下两句豪言壮语:让我的名字不上英雄榜,也书烈士碑。朝鲜的坑道、堑壕、山洞留下我多

少坎坷的足迹和美丽的梦想。那里有我成功的喜悦和失意的怅惘,有我真诚的友谊和浪漫的初恋。辗转在三千里江山6年之久,没有实现我的初衷,我的名字既没上英雄榜,也没书烈士碑。我把自己的遗憾告诉老柴,他说:“我的小小本上什么也没写,脑海里什么也没想。”话说得平平常常,掂量起来,分量很重。他没想也没写,却当了英雄又当了“烈士”。我问他不想见老战友,他说:“我的连长牺牲了,我的排长牺牲了,我的班长牺牲了,与我一同拼杀的3个战友也牺牲了,我想见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烈士、真正的英雄。”他的一番话,在我的心弦拨响了一声深重的低音,暗自唱出一曲《寻战友》影片的主题歌……

寻找你
不是要找回青春梦
那梦太沉重
寻找你
不是要重温战友情
那情太深太浓
寻找你
只是为了今朝再相逢
再相逢
又会留下多少情与梦
梦中有情情中梦,我还要寻找一个梦想的人,那是一位年轻烈士的镜中人。在战场上掩埋烈士时,我暗自许诺要为他找到她。

在拍摄《寻战友》的过程中,我常常漫步在四川的小镇上。那一天,沿着小溪走到一户青砖灰瓦木椽隔扇的门前,举目,门扉上挂着早年间一块木牌,牌上写着“光荣烈属”几个金字。无疑这户人家有长眠九泉的战友。虽然素不相识,却牵动着一颗军人的心。我启门走进,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用浑浊的眸子望着我。我问:“老人家,你家里什么人是个烈士?”老人说:“我的儿子。”我问:“你儿子什么时候牺牲的?”老人记忆清楚地告诉我:“我儿子是1951年5月18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牺牲的。”我问:“他是哪个部队的?”“是12军侦察连的。”老人哆哆嗦嗦取出一张布满泪

痕的死亡通知书,我伸手接过,烈士名叫王均,20岁。类似这样的通知书,我曾经为烈士填写过。

那是在朝鲜东线战地掩埋烈士遗体时,临时帮助登记过烈士遗物,令我最难忘的一位年轻烈士,军衣兜里装着一面碗底大的小镜子。小镜子后面夹着一张年轻美丽姑娘的一寸照片。从姑娘羞涩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一个初恋的故事。我望着面前这位年轻兄弟蜡一般圆润的面庞,微微闭合、长长密密的睫毛遮住眼帘,似乎尚有一线生机。他叫什么名字,身上没有记载。我登记后把小圆镜子重新装进他的军衣兜里,想象着有一天能够找到那个镜中人。

在老人家里,手捧死亡通知书的我偶发异想:“这个王均会不会是他?”便唐突地问二老:“你儿子什么模样?”“很乖,很像他爸。”我端详白发老翁,他也是圆润的面庞,也有一双长长密密的睫毛。我不禁又问:“儿子结婚了吗?”老人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定了亲的。”我问:“那个妹子呢?叫什么?”老人说:“叫玉珠。已经不是妹子了,在街口摆摊的老太婆就是她。”

执拗的念头驱使我告别二位老人,找到了街头摆摊的人。这里只有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佝偻着腰,头上耷拉下的几缕白发贴在汗湿的额头。我问:“您知道有位叫玉珠的么?”“我就是。”听声音才辨别出,她是个女的。我愣怔半晌,嗫嚅道:“你就是王均一的未婚妻?”她说:“那是哪一辈子的事情!”我问:“你现在一个人过?”她说:“命苦呀,找人相过面,颧骨高的人命硬,还没结婚,就把王均一克死了。”我开导她说:“长相不能决定命运,颧骨高的人有的是。”“倒是。”她扫我一眼,“你颧骨也高嘛,却是个有福的人。人和人没法比。”她的话如锋利的锥子,扎痛了中年丧夫的我脆弱的心。瞬间,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幕幕反差地叠化、叠化……玉珠递过一杯茶关心地说:“你不舒服?喝口茶吧!”我说:“茶苦,不喝。”为驱赶苦楚,我说:“买包烟吧。”

她递给我一盒大重九,打开,各自点燃一支,我们就像男人那样大口大口地喷着烟。我和她没有职业和身份的差别,有的只是两个同命运者的心在靠拢。人有时站得低一些,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

袅袅烟雾中,我又看见战地上那个怀揣小圆镜的烈士,冒昧地问:“你送过王均小圆镜子吗?”她说:“你怎么知道,我送过呀。”我相信又不敢相信她会是那个镜中人。她迫切地问我:“你见过他?”我点点头:“见过。”“是在朝鲜吗?”“是。”她追问:“均跟你说些什么?”我说:“他什么也没说,我见到的是他的遗体,他的墓穴朝着北方,朝着祖国的方向。”玉珠流着泪说:“他也想家呀!”我说:“也想你,他的军衣兜里装着你的小镜子。”她一把拉着我的手:“那就是他说的话嘛,走的时候他说‘我活着天天在镜子里看到你,我死了也天天在镜子里看着你’。”“啊!啊!”我的希望值升到顶端,这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个她,天下事竟能如此巧合!我惊喜地问:“你给他照片?”她抿嘴笑了:“我这辈子从没照过相,哪里有照片给他。照片哪里有镜子看得真。”我的希望跌到谷底,长长地叹了口气,觉得对不起她,握着她的手安慰她:“再找个合适的人过日子吧。”她说:“不找了,我等吧,也许他没死。求求你,你们能找到大英雄柴云振,也把王均给找回来吧。我常在梦里见到他,他叫我等他。”也好,那就让她在梦里等待,在等待中做梦吧。

那个镜中人在哪里呢?我在继续寻找着……

如今,时间又过去几十年,我老了,无力再寻找了。可幸运的是今年清明节前,在电视里,我含泪看到国家将散落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遗骨运回国的隆重场面,让失散60多年的战友们魂归故里,得以与亲人重逢。

庆幸吧,归来的战友们,当年咱们出国时,国家还很穷,如今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一支现代化军队浩浩荡荡,足以告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红旗颂》《长征交响曲》《我和我的祖国》等红色旋律在台上激昂响起,观众也不由自主哼唱,全场俨然成为大合唱的海洋。

无独有偶,红歌也悠扬在田野乡间。西安三育村,百亩油菜香,百余名村民在艳阳天里走向田间地头齐唱红歌。犹记得革命岁月,洗星海拎着马灯到山岭间教歌,让革命的歌声飘洒山野。

今时今日,红歌更常在军营唱响。烂漫春日,空军某旅红歌大赛“红色咏流传”盛大开唱。

红歌因何经久不衰,让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人们情发一心?

传唱红歌,是珍视民族血泪和家国记忆。红歌以颂扬革命和祖国为主题,具有充沛的感情张力和深沉的时空印迹,总能叩响人们红色记忆的心门。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中,《黄河大合唱》高票入选。裹挟着革命岁月的洪流,唱出民族磅礴的意志,《黄河大合唱》背后的故事更引人唏嘘。

在透风的窑洞里,连白糖都匮乏的年月,尚在病中的洗星海想吃些甜食激发音乐灵感而不得。好友光未然想办法托人借了些白糖。2斤白糖,6天6夜,这注定写进历史的数字辉映着《黄河大合唱》的澎湃不息。

《黄河大合唱》只是万千缩影之一。那一首首反映英雄年代的歌曲,唱出了大众心声,律动了人民情感,早已化作民族精神的写照。这也是为何今日传唱红歌的热潮不息。

传唱红歌,需要警惕经典颠覆和精神放任。曾经某团体恶搞《黄河大合唱》的视频流传,一时舆论哗然。恶搞之举以恣肆的矫饰和孟浪的嬉笑博人眼球,无疑支离了艺术经典的风貌。恶搞者不以为耻,可曾忆起革命前辈的血泪?自毁长城后,民族精神将何处安放?勿怠勿忘,才能扭英雄泪。崇高不可解构,黄钟大吕不可毁弃,民族文化不能颠沛流离。

红歌艺术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兼具民族优秀文化“形”与“神”,拥有深厚的精神基础。爱红歌,唱红歌,国人只有守住传统文化的根系,才能让民族精神枝繁叶茂。

传唱红歌,更是烛照时代情怀和使命担当。一段学生聚餐时高唱红歌的视频曾被争相转发,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在餐厅唱响《我爱你中国》。唱至高潮部分,同学们情不自禁地起立,在热烈与真挚的氛围之中,一起鼓掌、放声高歌!情之所至,歌以咏怀。红歌合唱何以刷屏网络?滴滴泪水何以打湿眼眶?因为红歌真正体现了时代文化的审美格调,展现了华夏儿女的情感诉求。心灵涤荡由此而来,情感共鸣由此而发,民族自豪感由此而生!

何须问红歌新唱的原衷?民族优秀文化本应映照当代文化,当代文化自该激荡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每个华夏儿女都应有所担当。

崇尚传统,仰望崇高,请传唱起红歌,激起心中的黄钟大吕。

山之信仰

■潘玉毅

说起山,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青色的,不然何以有“青山”一词?然详加思索,人们又觉得山应该是墨黑色的,前人笔下,类似“青山如黛远村东,嫩绿长溪柳絮风”的句子不胜枚举。而井冈山与人们印象里的山脉都不同,它是红色的,绘出有二:其一,山上最美的杜鹃花是红色的;其二,与山相关的精神是红色的。

井冈山的杜鹃花花期很长,可以从4月一直绵延到6月,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更令人称奇的是,此间的杜鹃花盛开时,有红、黄、白、紫多种颜色,各有各的好看。但美得最惊心动魄的还是红色的杜鹃。它们像燃烧的火焰,像奔放的热情,更像人心中那股不屈的意志——无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摔多少跟头、留下多少伤痕,依然坚挺傲骨,保持前行的动力。

当春风绿遍山原,当细雨洒透大地,一株株杜鹃花顺着崇山峻岭开满山坡。山花烂漫,不只好看,更兼壮观。且不说别的,单只那笔架山上十里杜鹃长廊,就足以叫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若我们有孙悟空般腾云驾雾的本领,立于高处眺望,当可发现,因满山杜鹃集生成林,山与杜鹃,杜鹃与

山,已然不可分。那情状,分明整座山都已长成一株硕大的杜鹃,就像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

国人在提到井冈山的时候,多半会忆及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不独是我,井冈山于很多人而言,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很多人出发的起点,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归宿。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队伍抵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次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残部与毛泽东会师,两军合并一处,计万余人,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人间的山峦,几经沧海,与千百年前相比,除了高低,并无不同。可是一旦有了人迹,它就拥有不一样的意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无数红军战士,以此为依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井冈山精神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也成为了一座山的信仰、一个时代的信仰。时过境迁,虽然去井冈山可以有很多理由,可以看花的名义去,也可以赏景的名义去,但今人多数还是选择以朝圣的名义。

足迹所至,井冈山上古木参天,花繁叶茂。人在游览的时候,循着杜鹃身影,循着前人行踪,一步一停,满怀敬仰;而山上的草木山石似通人语,言说着四时的雨雪风霜,言说着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就像一名资深导游,告诉你曾经的花怎样开又怎样落,告诉你谁曾经来过又走远了,告诉你此间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或许,于井冈山而言,草木如人,春开冬落,亦不过是过客一名。但生在此间,行至此间,草木也好,人也好,所得皆是一种精神的烛照。井冈山精神永存,一如山之信仰,亘古不变,不老不移。

文化视界

爷爷的肩头

■周敬翔

小时候,常坐在爷爷肩头。走村过户,乡里乡亲常和他问好:“又带孙子走,到我家家坐坐,呷口好茶……”虽已年过七旬,爷爷仍健步如飞。稻田中,山坡上,他的背影随处可见,或扛一把锄头,或挑一担箩筐,或肩上坐着一个娃。

爷爷经常和我分享他的故事——坐在他的田地里或是亲手“培养”的油茶高坡上。记得最深的是在上甘岭的一次战斗:“我们不懂对方有多少人,听连长说,这个山头已经争抢了12个小时。在我们等待的几个小时里,没看到有队伍返回,只有受伤的战友。炮火连天,飞机吼叫,大地都在颤抖。终于,上级给我们下达命令,实施分队步兵突击。我们相互约定,若谁能回来,请把写好的家书和留好的头发寄回家……”

作为长子,爷爷说他当时脑海里闪现母亲的劳累身影和弟弟妹妹的欢笑。父亲就是在战场上与鬼子的生死搏斗中牺牲的。那种情况下,我必须往前冲!只要胜利,就算死也要拉几个洋鬼子。我们绕过山脚,借着密集的炮火对敌人进行侧翼突击时,遇上了美国佬的潜伏小分队。我们3个班对敌进行火力攻击,往前跃进……”讲到最后,爷爷用手抹泪,默默无言。

2012年,我年满18岁时,跟家里说“我要去军营”。爷爷知道后,皱一下眉头,冲我笑了笑,深深吸了一口手头残留的烟丝,转身走进厢房。年底,我顺利入伍,走之前与爷爷道别,他依旧没有说话。可是,没想到这成为我们爷孙俩最后一次道别。

当年腊月二十八,噩耗的刀锋划在我的胸膛——爷爷走了。父亲说,我入伍后,爷爷一直很牵挂我,却什么都不说。在看过我寄给家里的信和照片后,难以压制心头的激动,因气血冲顶导致

头晕。父亲扶他进厢房休息,他却再也没有醒来……

葬礼匆匆结束,父亲叮嘱我不要有回家的念头,要遵守纪律……只有训练、没命的训练,才能把我从噩梦里解脱出来。每一次训练又苦又累,想要放弃时,我会抬头看向云端,直告告诉我,爷爷就在云的后面,微笑着看。

回乡探亲,拖着沉重的脚步,我默默来到爷爷的坟头。他的突然离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话语,只有永远萦绕脑海的战斗故事和保家卫国的义无反顾。无声地接过爷爷肩头的肩章与钢枪,才知道,肩章为什么那么重,钢枪为什么那么亮。

一瓣心香

千秋胡杨(油画)

朱志斌作

